



宜城党史資料 2

宣城党史资料

第二辑

中共宜城县委党史资料征集编研委员会办公室

1986年10月

目 录

- 王全国同志给宜城党史办来信 (1)
马兆祥同志给宜城党史办来信 (4)
我的回忆 杨树民 (5)
孔湾地区的地下斗争 张克和 (20)
党派我回宜城 邓 烈 (28)
我所知道的周守惠同志 黄民伟 (37)
从黄龙垱到王集 许楚材 (42)
男儿不畏死 但求风格贞
——忆父亲张明汉烈士 张青联 张青云 (50)
回顾襄枣宜 马兆祥 (67)
一段难忘的经历 任子衡 (75)
忆荆钟宜县 蒋占义 (82)
解放南、宜战斗的历程 徐 蓬 (86)
宜城建政及其它 王璞玉 (97)
建国初期的宜城县 赵化鹏 (103)
建国初期的回顾 王开绪 (114)
中国共产党在宜城斗争史大事记 县党史办 (121)
大革命时期宜城农民运动综述 汤茂荣 (147)
土地革命时期鄂豫边特委
(临时省委)在新街前后 孙明书 (162)
关于孔湾武装暴动问题的初探 龚新友 (181)
中原南路突围部队途经宜城 王长江 (195)

王全国同志给宜城党史办来信

宜城县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

来信及《宜城党史参考资料》已收到。

关于抗日战争初期，宜城抗日救亡活动及党组织建立的问题。据我的记忆：一九三八年底，党派我以第五战区文化工作委员会宜城文化站主任名义到宜城工作，同时派去的有陈文林、邓传智（现名邓烈）二同志，由于我们是公开合法身份去的，当时宜城县长陈英武为宜城文化站安排了房子。我们到后即积极开展抗日救亡活动，许多青年和有志之士热烈响应。邓传智在家乡农民中也开展了工作，并物色了一批发展党员的对象，但还未来得及发展。一九三九年春节前，鄂北的形势开始变坏，文化工作委员会被取消。我接到上级命令调离宜城，到襄樊近郊工作委员会工作。陈文林和邓传智仍留下工作，以后的情况就不知道了。党派我到宜城工作的同时，还派阮东泉去南漳、保康工作。我走后，宜城的工作可能交归阮东泉、张书武领导。一九四〇年初，宜城、南漳与荆（门）当（阳）远（安）合组为一个特委，可能在这个时候，吴云鹏同志领导宜城的工作。至于宜城和欧庙开始时是不是一个支部，我不清楚，请找有关人员调查。要说明的是，陈文林调宜城工作前即是党员，当时宜城的工作范围

不包括欧庙。

此致

敬礼！

王全国

一九八四年八月十四日

宜城县委党史办：

来信收到，因忙未及时复信，请原谅！

一、王家集地区最早加入中国共产党组织的，我准确知道的是王全芝。他原在襄阳二师读书，受肖楚女的影响，参加了二师学潮，是同李实等被学校开除的三十六人之一。北伐大革命时，他同王全芳、王文锦、王星伟、江执柄（现名江啸平）、王全成、王全文（现名王作舟）等，在当地组织农民协会，搞农民运动。“四·一二”事件后，鄂北军阀张联升叛变，当地土豪劣绅胡正运、胡国贞等反动势力到王集抓人，王全芝和王全芳逃往武汉，然后转到南昌参加“八·一”起义。起义后随军南下，王全芝改名王贯一，当时任连指导员，在会昌战役中牺牲。那时王集地区还有哪些人参加了党的组织，我不清楚，可找江啸平（现在张家口离休，属文艺系统，原系王家集附近杨湖汊人）、王作舟（湖北省博物馆退休干部，住武昌）等人调查，王集的李朋友还健在，也可能知道一些情况。

南昌起义部队在广东潮汕地区失败后，王全芳又回到本地工作，任过王集特支书记。这时党员较多，王文锦、王星伟、王全成、李习珍（李家街人，后叛变）何开明（新屋畈

人)等都是党员。其间，王文锦可能任过支部书记，王星伟也可能任过支部书记。这时期的党组织直到领导一九三〇年武装暴动为止，无重大变化，其党组织活动情况，可找襄阳县党史办及李明友等人调查了解。

三、王全成，北伐大革命失败后曾到冯玉祥部队干过，以后回到本地工作，一九三〇年配合鄂北总队在王集地区暴动后任红军二十六师参谋长，一九三一年在王集地区的一次战斗中受伤后牺牲。

四、王文锦，一九三〇年暴动后任游击大队长，后在攻打双沟(应为流水沟——编者注)战斗中牺牲。

此致

敬礼!

王全国

一九八六年二月二十四日

马兆祥同志给宜城党史办来信

宜县委党史资料征编办公室：

八月二十二日的信和《党史参考资料》二十二期都收到了。我《回顾襄枣宜》谈话纪要，基本上同意你们的整理，个别情况有些更正供你们参考。

革命历史照片，过去没有注意保存。洪山地区革命烈士纪念册，可能湖北省革命(文物)陈列馆有，有机会请去查询。我不会写诗，在中原突围（1946年）写过一首，现抄供你们参考。

雄兵六万出围关，
为尔不成誓不还；
埋骨何须桑梓地，
人间到处有青山。

此致

敬礼！

马兆祥

一九八四年八月三十日

我的回忆

杨树民

回顾总结党的光荣历史，是我们这些老战士和幸存者义不容辞的职责。但宜城县委派来的同志要我谈谈中国共产党在宜城的革命斗争史及我本人的革命经历，却使我感到很为难。因为我虽然参加革命几十年，在家乡活动的时间却很短，根本无法准确客观地说清宜城革命斗争史的全貌，这是其一。其二，关于我本人的经历，我觉得没有详细叙述的必要，希望多宣传那些为革命抛头颅、洒热血的革命功臣。下面，我想简要地谈谈宜城革命条件提要、宜城的大革命运动和创建党组织的概况，以及我在一九三五年被捕后的一段经过。

关于宜城革命条件提要

宜城地处鄂西北，北临襄阳，南望荆州，汉江横贯全境，交通十分便利。加之土地肥沃，物产丰富，经济文化也比较发达，自古为兵家注目之地。荆襄每遇战事，宜城便首当其冲。到了清末民初，又常有一些军阀屯驻于此。这些军阀既拉丁拉俄，又派粮派款、增税添捐，使得本来免强能够糊口遮体的穷苦农民十有八九不得温饱，长三月和冬腊月间

多要离乡乞讨。即便是稍为富庶的农户也常感招架不住。大中地主和恶霸豪绅则将驻军所加粮款压到佃农百姓身上，不损自己半根毫毛。因此，穷人愈来愈穷，富人愈来愈富，阶级矛盾愈演愈烈。

在那兵荒马乱民不聊生的年月里，一些有钱有势的地主豪绅利用宜城交通便利的良好条件，争相开设了粮行和京广杂货店铺，大发横财。有的奸商还自印纸币，愚弄百姓。若遇战乱或其他变故，老百姓用血汗换来的纸币就会贬值或不能使用，纸币发行者却中饱私囊。更有甚者，是一些奸商为发大财，竟自己放火焚烧商号或勾引土匪抢劫，造成商号倒闭的既成事实，来贬废自己发行的纸币，坑害广大人民群众。

这些大户人家不仅控制着大量土地和商号、粮行，还掌握或控制着地方政权。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增税添捐，派粮派款派仗，欺压穷苦百姓。其中尤以朱家嘴团防局团总“西洋大臣”朱金庵、小河团防局团总、“北洋大臣”丁仲庵、璞河垴的“南洋大臣”徐约庵、板桥店的“东洋大臣”傅德庵、县警备队长“中洋大臣”姚建庵等宜城“五庵”为最恶劣。他们经常无中生有的制造事端，寻衅取利，或依权仗势，鱼肉百姓。群众痛恨地编歌骂道：宜城“五庵”，无法无天，金钱由我要，美女由我玩，只要能够弄到手，那怕穷人哭皇天！关于他们搜刮民脂民膏的事暂且不说，这里只谈他们荒淫无度、强占民妻民女的一个例子。朱金庵当时曾公开说过：“生我者不骂，我生者不淫”，他在朱家嘴一带强抢民妻民女就如家常便饭。有一年，朱金庵霸占本乡某农民的妻子为妾后，该农民气愤不过，告到县衙，县法院在证据确

苗的情况下，判决该女子回户，朱金庵不得再强行占有。然而刚出法院，朱金庵派人又将女子抢了过去，真是无法无天！

每到秋收季节，农民辛辛苦苦地把粮食及其他作物刚收到场，地主便来收租课，保甲长跟着收捐税，债主也来逼债务，把农民劳动的果实瓜分得一干二净。有些农户因所收不够瓜分，还要认下笔笔新债，待下年秋收时再偿还。那时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天不怕，地不怕，就怕丝瓜架子塌，”说的就是农民害怕进入秋收季节。由于地主阶级掌握着对人民的镇压之权，广大穷苦百姓对地主阶级的残酷剥削和欺压稍有不满或反抗，便会招来灾祸。轻者倾家荡产，重者下狱受刑，甚至丢掉性命。

在宜城“五庵”和其他大大小小的土豪恶霸欺凌下，穷苦农民被逼得走头无路者不计其数。有的流亡他乡，有的去充军吃粮，还有的铤而走险当土匪。所以，在民国十几年间，从鸡鸣山到柴口雅，从东山到西山，土匪多如牛毛。其中有本地的，也有从外地流窜来的。如孙家咀有个农民孙德惠，原有六亩地，本人种田，其父经营小生意，日子还勉强过得去。谁知本乡恶霸看中了他的妻子和女儿，便起歹心，强奸了他的妻子，又抢走了他的爱女。孙德惠为此去衙门告状，衙门里的人却说：“人家有钱人不会干这种事”，一推了之。孙德惠花了银钱，也没打赢官司。他气愤难平，只好上山当了土匪。

活动在宜城各地的土匪为了立足，竟相给当地团防局送礼，与之拉关系。致使各地团防局都变成了土匪的“保险公司”。一些土匪为不得罪官府和有钱有势的豪绅，便把抢劫

的矛头转向一般农家。广大人民群众不仅要遭受地主奸商的盘剥和官府、军阀的欺压，还经常受到土匪的劫掠。

种种残酷的社会现实，使广大农民群众在心中积压了深刻的怨恨，孕育了反抗黑暗统治的社会潜力，这就是形成宜城人民起来革命的首要条件。反动统治阶级内部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蚂虾的争斗，又给人民举旗造反提供了一定的条件。所以，当反帝反封建反军阀的革命火种在宜城一经点燃，便烧起了熊熊烈火。

以上是宜城人民举旗革命的根本原因。而学生运动则是促使宜城人民举旗革命的又一重要因素。

“五四”运动以后和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宜城分别在外地和本县读书的一批知识青年首先接触到了革命的新思想、新理论。他们同全国各地的革命青年一样，参加了遍及全国的学生运动。宜城县立模范高等小学、县立女子高等小学、县立乙种农业学校的学生成立了宜城学生联合会。“五卅”惨案后，又成立了宜城学生外交后援会。学生们到处贴标语、发传单、搞讲演，还成立了仇货（即外国货）调查组，多次举行反帝反封建的游行示威活动。并在窑湾码头拦截和焚烧了“晋隆盛”商号进口的英国哈德门香烟、铁锚牌洋油。仇货调查组还将所有商号的仇货或封闭或收缴或禁止销售，在全县影响极大。由于大势所趋，县当局对学生们爱国举动既不支持，也不公开反对，采取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当学生们高呼着“抵制仇货”、“反对经济侵略”的口号到“蔡祥茂”、“潘华昌”、“关祥兴”、“晋隆盛”等大商号查封仇货时，这些商号的阔老板也只是说好话，表示照办。当时，一些小市民也参加了对外国货的查封和焚烧活

动。这些活动的主要领导者是县立模范高小的贾景韩、龚传斌、李同运和乙种农业学校的周伯泉、杨有馥等八九个具有爱国思想的学生。我也参加了当时的学生运动。

在这次学生运动中，各商号老板通过大绅士、商会会长胡聘山出面，用请客和送礼的手腕买活了部分教员。于是，便出现了师生间的对立。少数教员极力反对和阻止学生的革命活动，学生却越闹越厉害，并大骂教员是亡国奴。有一次，学生们在报恩寺开会号召群众团结起来，一致抵制仇货。教员李仲莫、刘某某和杨翠堂带着校工突然闯入会场，严厉斥责学生的爱国行为，并赶散了参加会议的群众。由于缺乏正确路线和革命政党的领导，学生们的满腔热情持续不久便开始冷淡下来。一些学生的革命意志逐渐消沉，还有一部分学生虽愤愤不平，却又无力回天，只好敢怒而不敢言。尽管如此，这次学生运动还是为后来的革命活动培养锻炼了一批骨干力量，准备了良好的土壤条件。

后来，我和这批学生中的一部分人相继考入襄阳各校，参加了震惊鄂北的“二师学潮”。当时，在省立第二师范读书的有我和朱家嘴的刘尔朋、孔湾的李调梅、王集的王全芝等人。胡东之等人在省立第十中学即襄阳鹿门中学学习。适逢肖楚女来鄂北传播马克思主义，我们这些人才开始接触到真正的革命思想。那时，我们宜城籍的学生与肖楚女接触较多的有白维俊、刘正已、史作然、胡东之、李调梅、刘尔朋、胡天定、王伯风。肖楚女常以开展足球赛为名，集会宣讲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其他革命思想。他还在进步青年中发展了一批国民党员。我和白维俊、胡东之、刘尔朋、王全芝等人就是在这一时期加入国民党组织的。记得为了筹措经费，

肖楚女还曾经组织人员开展抓豪绅活动。胡东之和刘尔朋参加了这一活动。一九二三年八月，他们在襄阳城内绑了一个叫李小街的大地主的儿子，被反动当局查觉，逮捕了与肖楚女有关系的襄阳天主教教会医生梁习之。梁供出了肖楚女的革命活动，致使肖楚女遭当局通缉；被迫离开了襄阳。刘尔朋也为此事遭到通缉，他虽逃脱，其父刘慧生却被襄阳当局抓去，关进了大牢，到一九二六年才放出来。他家的财产也为此而花费了大半。

一九二五年夏，谢远定回鄂北组建共产党，在鹿门中学任校监，并在二师兼课。他继肖楚女之后主动积极地与进步青年学生交朋友，培养和发展了一大批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王全芝就是由他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谢远定在襄阳一直活动到北伐战争前夜才离去。

我们这批在襄阳读书的学生回县后，大部分都参加了宜城的大革命运动，其中王全芝、胡东之等人成为我党在宜城地区活动的主要骨干。

关于宜城大革命运动和建党概况

宜城的大革命运动是从创建国民党组织开始的。一九二六年夏，在武汉读书的国民党员江执柄（宜城羊祜人）受上级派遣，回县组建国民党组织，发动农民运动。当时，正值我们这些已经毕业或放暑假的学生在家闲住，大都成了江执柄联系的对象。不久，周伯泉、杨有禄、万翠琼（女）、章扶青（女）、熊亚兰（女）、胡天经、谭籍安、王恩甫、李薪樵及县邮局邮递员曹某便被发展加入了国民党。分别在江家榨屋、板桥店、孔家湾、朱家嘴、姜家台子和县城建立了国民党的区党部。

从武汉回县的高贡古即简发生和邓传诰（均系共产党员，又是国民党员）。江雷河也组建了国民党的区党部。到了阴历十一月，江执柄等人又成立了国民党的临时县党部（实为国民党宜城县党部筹备委员会一编者注）。江为主要负责人，委员有杨有馥、周伯泉、李薪樵、甄史文、章扶青、万翠琼、雷亮生（雷寅）、王恩甫。年底，为了提高党员的素质，县党部筹委会还将胡天经和魏则鸿、李惠州送往省党干训练班和省农运讲习所学习。他们在学习期间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李惠州后来因不服从分配被讲习所开除。

一九二七年一月一日，县党部筹委会主持召开庆祝北伐胜利的祝捷大会，江执柄等人在会上作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公开提出了“打倒军阀”、“打倒土豪劣绅”、“打倒贪官污吏”的革命口号。宜城县长及驻军连长、商会会长等各界知名人士也一致表示支持北伐战争，拥护国民革命。宜城县国民党组织至此正式公开。

这次会议不久，宜城地区的大革命运动就逐步开展起来了。

一九二七年一月，在汉读书的胡天定作为宜城的国民党代表，出席了国民党湖北省第一次代表大会，会后被委为国民党湖北省党部特派员回县指导工作。三月，国民党宜城县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县城东街紫峰书院举行。大会选举产生了国民党宜城县党部委员会。江执柄为党部执行委员会常委，谭籍安、杨有馥、李薪樵、万翠琼、雷寅等为执行委员。甄史文、周伯泉、章扶青等为县党部监察委员会委员。这时，胡天经和魏则鸿以省农民协会特派员的身份回县领导宜城的农民运动。他们经过短期组织发动工作，于三月底主持召开了

宜城县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大会传达贯彻了省农民代表大会“宣传大纲”和国民党省党部颁发的《惩治土豪劣绅暂行条例》等文件，研究部署了全县农运工作，选举产生了以胡天经为主要负责人的宜城县农民协会及商民协会、妇女协会。农协会主席雷润之，商民协会主席雷亮生、沈朴村，妇女协会主席万翠琼、熊亚兰。接着，全县各地相继召开群众大会，也成立了农民协会，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当时，只有流水沟是个死角，那里反动势力十分顽固，农民运动没有开展起来。全县规模较大的农民协会是雷河和孔湾，两地农协会员均有万余。其次是朱家嘴农民协会，会员八千，王集农民协会有两千会员，板桥店和窑湾两地的农协会员也达一千。农会的主要活动是反对封建压迫；禁烟禁赌；提倡男女平权，给妇女放足等等。一些地方还废除了苛捐杂税及一些不合理的章程和制度。

四月初，县农民协会和国民党县党部督促县长逮捕了“南洋大臣”徐约庵、“北洋大臣”丁仲庵及朱家嘴的朱金庵、板桥店的刘仲谋等数十名作恶多端的土豪劣绅，出现了人民群众扬眉吐气的大好形势。可惜“四·一二”不久，这场如火如荼的大革命运动就被反动派镇压下去了。

我党在宜城地区的党组织自始至终都站在大革命运动前列，是革命的核心力量。一九二六年秋，王全芝同志在王集建立了中共王集党小组，同年冬又秘密组织了王集农民协会。发动和领导了王集地区的农民运动。一九二六年秋至一九二七年初，简贡古、邓传诰、胡天经、魏则鸿、胡培洲、贾衡平等从武汉回县的共产党员陆续介绍胡天定、胡文运、陈端青、谭籍安和我四叔杨世健、二弟杨有鸿等十几名进步

青年加入了党组织，成立了中共宜城县委（据考，当时尚无县委，只有一个支部——编者注），书记胡天经。宜东地区也在此前成立了以王文锦为书记的中共王集支部。其后，魏则鸿、胡天经、谭籍安、胡天定、胡文运等人分赴孔湾、朱家嘴、板桥店、城关、窑湾等地，组织和领导农民运动。

“四·一二”后，胡天经等同志因身份暴露，转移外地隐蔽，宜城党组织的领导工作交由贾衡平和胡培洲二人负责。留在宜西的其他负责同志还有简贡古、李调梅、陈端青等人。他们时常在我家开会议事，吃住都在我家。因我在那时还没有加入党组织，李调梅曾笑我不如二弟。一九二七八、九月间，国民党在各地重新登记党员，贾衡平、简贡古、邓传诰、刘自明、陈端青等人便乘机登记打入了敌人内部（其中有些人后来叛变了革命），杨世健、杨有鸿、胡培洲和王集党支部的王星伟等同志，也就地隐蔽下来。为后来的土地革命时期恢复和发展党组织、开展武装斗争，积蓄了领导力量。

关于我在一九三五年被捕入狱的一段经过

一九二八年春，枣阳的程克绳同志组织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鄂北总队。胡天经也在这时从南阳回到鄂北，专门为鄂北总队筹备枪支弹药，他动员我参加了这项艰苦的工作。在胡天经的帮助下，我读了一批革命书籍，增长了不少革命知识，加深了对党的认识和理解，坚定了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的革命信念。七月，经中共枣阳县委负责同志徐化龙、徐镜铭介绍，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光荣的红军战士，并改杨有鹏为杨苏民，参加了开辟和创建襄枣宜革命根

据地的工作及艰苦卓绝的反“围剿”斗争。一九三二年夏，鄂北土地革命惨遭失败，我和部分同志从襄枣宜苏区回到宜西，准备继续开展武装斗争。五月二十一日，杨世健、徐化龙和我三弟杨有鹤等人在我家桃园秘密开会，不幸被叛徒出卖遭到敌人围捕。我脱险后到谭垴找贾衡平、刘尔朋研究对策，他们说要去武汉找上级党组织，我只好放弃原来的打算，同他们前往武汉。途中他们改变主意，要往上海寻找党中央，我没同意，一人返回，在谭垴交通站负责人王长富护送下离开了宜城。为了安全起见，我又改杨苏民为杨树民，只身在襄东和枣西、宜东、钟北等地寻找党组织。由于各地党组织均被敌人破坏，什么也没找着。一九三三年初，我只好南下到湘鄂边的新归坝参加红三军，从此开始了新的战斗历程。

一九三三年十月，在湘鄂边的一次反“围剿”战斗中，我胸部中弹负伤，被迫离开部队。后由鄂北襄宜南边县委（实是襄沙接头站——编者注）通过关系，把我送进武汉协和医院治疗。当时说我是富家子弟，被土匪绑票时逃命受了伤。

一九三五年一月，我在协和医院治愈枪伤。出院后由于未与鄂北党组织接上关系，暂住于在汉阳崔家墩小学任教的简贡古处。通过简贡古介绍，我结识了鹦鹉洲进步青年禹希涛，禹当时正在办一种秘密的油印小刊物《红力》。该刊物以宣传爱国主义为主要内容，专门抨击时弊，揭露黑暗，在汉影响很大。我认识禹希涛后便参加了《红力》的编辑和发行工作。没多久，禹希涛及许淑云等《红力》杂志社的同行被当局逮捕。禹妻当时用电话通知我说：“妈妈有病，要吃